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前瞻性理论

——潘懋元学术思想研究之二

杨广云*

在《试述潘懋元先生的学术思想体系》(载本刊 1996年第 2期)一文中,我们概述了其高等教育思想的理论框架。然而潘懋元先生并没有满足于抽象的理论框架,而是具体、深入地研究了制约当代中国高教改革的内外部主要因素及其关系。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科技革命、市场经济、文化传统以及来自其自身的严峻挑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潘懋元先生义不容辞地迎接挑战,为中国高教改革的若干趋势作了科学的预见和理论论证,从而为中国高教改革的实践奠定了若干理论基础。同时,他在运用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具体分析中国高教改革的实践问题方面,为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作出了方法论的示范,对于克服教育理论界脱离实际和教育实际部门脱离理论的现象有重要的启示。本文拟就潘懋元先生对市场经济、科技革命、文化传统等外部因素作用下的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以及高等教育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若干重大关系的理论作一整理和归纳。

一、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的关系 以及高教办学体制改革的三大趋势

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教育理论界对此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是乐观派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是积极的,有助于高等教育内部形成竞争机制,给高等教育改革带来压力、活力和动力;一种是悲观派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是消极的,将会使高等学校迷失办学方向,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导致师生人心不稳。针对这两种相反的观点,潘懋元先生认为,两种对立的观点如果都持之有据,它们也各有其片面性。首先,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不是主观上要不要、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客观的必然,这是教育的外部关系使然。根据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任何社会的高等教育都必然受各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制约,并为其服务。相对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高等教育受市场经济的冲击更为直接、深刻。第二,市场经济的冲击给高等教育带来压力,有压力才有动力,因此,冲击包含着合理性;但有时冲击会不顾高等教育自身的规律,或超过人们的心理承受力,则可能给高等教育带来消极影响。就冲击的总趋势来说,是有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包含积极面和消极面。积极面是

* 杨广云,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指:它有利于高等学校改革课程(广义),使人才培养符合市场经济需要;有利于提高师生双边活动质量;有利于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引进竞争机制;有利于扩大财源,改善办学条件、师资待遇。消极面是指:由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是资源配置基础方式的转变,将相应地带来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和权力利益的重新分配,而这需要一个艰苦的转变过程,同时人们对这种转轨的心理适应也有一个过程。由于市场经济规律与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的矛盾,市场经济的某些消极面可能会长期存在,办学必须不断地进行协调。既然市场经济的影响具有积极、消极两方面,因而高等教育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就应当是主动适应,而不是被动适应。主动适应是指高等教育发挥主体的选择、判断作用,被动适应则是闻风而动,不管形势如何、政策正确与否都“积极”响应。这种盲目适应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主动适应首先要求在进行高等教育决策时,要考虑这些决策是否适应高等教育活动的多种社会因素的制约性,即既要适应经济,也要适应科技、政治、文化等方面发展的需要。建国以来高等教育忽而政治化,忽而商品化、市场化,即是片面适应的结果。第二,在进行高等教育决策时,不但要使决策符合教育的外部规律,而且要符合教育的内部规律。凡是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决策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第三,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虽然猛烈,然而从长远来看,科技革命的冲击更为根本。只有适应科技革命的冲击,高等教育才能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冲击。迎接这两个挑战,应统一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高质量的专门人才上来。

潘懋元先生认为,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的宏观运行机制和办学体制上。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的若干趋势,作了如下预见、论证和规范。

1 对民办高等教育体制形成的预见

传统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单一的公有制,从而只能举办公立学校而不能存在私立学校。建国初期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使得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私立高等教育体制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社会主义性质的重新认识,我国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80年代中期,潘懋元先生就发表文章,论证非公有制成分经济的发展必然对高等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因此,民办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出现与发展有其必然性。这给予了当时刚萌芽的私立高等教育以理论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办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证实了他的预见。此外,他对民办高等教育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论点。第一,关于民办高等教育的社会性质。潘懋元先生认为,民办高等学校实质为私立学校,“但一所学校的社会性质,并不决定于经费的来源,而是决定于办学方针、教育宗旨、以及体现方针、宗旨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管理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私立学校肯定要体现创立者的意愿,但都必然遵守各自国家的教育方针法令。因此,只要配合以制度化的评估,我国民办高等学校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可以保证的。第二,发展私立高等教育是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的矛盾的重要途径,但这不等于政府不必给予资助。发达国家已逐步认识到私立高等教育对开发人才资源及扩大教育机会的重要性,都纷纷对私立高等学校进行补助,并将其纳入国家的教育体制中。第三,关于民办高等学校的质量与管理问题。一般认为,私立高等学校的发展与政府的关系历来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而潘懋元先生认为,这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制定必要的法规,通过质量标准的实施来体现政府和社会对私立高等教育的管理,而立法的意义不在于限制,而是扶持、引导。

另外,质量偏低并不是民办高等学校的必然现象,关键在于更新质量观念,改善质量管理

2 对高等教育地方化趋势的论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在协调规划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有了较大的自主权,而地方经济的发展、发达,必然要求所在地的高等学校为其服务。因此,高等教育必须改变管理体制,高等学校除服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外,将更多地面向所在区域、地方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自主办学。这就出现了高等教育地方化的趋势。高等学校的创办者、办学者、管理者三者责任的明晰化,也将为高等教育地方化提供法律保障。潘懋元先生同意他的学生邬大光博士的观点,认为高等教育地方化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高等学校为地方经济服务,成为地方的文化科学中心;其二是以地方财政拨款作为高等学校办学资金的主要来源。前者是高等教育地方化的本义,后者是其必要条件。他还指出,高等教育的财政地方化在经济体制改革条件下较易实现,而高等教育真正树立起为地方服务的观念,却需要对高等教育的内部机制进行较大的调整。高等教育的地方化有助于推动经济体制转轨,广开教育投资渠道,强化地方对高等教育的调节机制,从而更好地体现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间接调控功能。但同时,潘懋元先生也指出,高等教育地方化并非不要国家对地方高等教育需求总量、结构的调控,而是要在这一前提下,分别协调好地方与全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平衡。“国家侧重管理部分重点大学,扶持地方院校中的一批重点学科,而大量的其他高等院校可重点面向地方。”地方高等院校必须既受国家统一指导,又与重点院校有各自不同的面向重点,才能建立起高等教育地方化的良性循环。

3 对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多元化趋势的规范

潘懋元先生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缓解我国高等教育经费危机的主要途径在于增加财政拨款。但在近期内,由于国家处于新旧体制转换的困难时期,故应当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教育经费,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待遇;同时,应当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对于高等学校中的各种创收活动,应当根据其利弊关系分别制订相应政策,规范筹资行为,以正确发挥高等学校的三大职能,而不是本末倒置。(1)对利大于弊者,应当鼓励和扶持。如建立高科技产业,挖潜扩大办学规模,开展成人教育和社会服务等。(2)对有利有弊者,应去弊存利。(3)对有弊无利或弊大于利者,应加以制止或劝阻。如挪用教学、科研经费搞证券交易,组织教师炒股票,出借学校招牌,向师生乱收费,私自出租学校房产、设备,化公为私等。对高等学校实行“有偿分配”、“完全自费”、建立“贷款制度”的建议和做法,潘懋元先生也发表了深刻的见解。他认为,由于培养大学生的“公费”来自财政拨款,而政府的财政拨款主要来自国营和私营企业的税收,因此,“有偿分配”不符合国际通例,更阻碍了人才合理流动;“完全自费”既不符合各国通例,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可能导致高校招生变“择优录取”为“择富录取”;“贷款制”虽在许多国家实行,但是偿还率极低,成功实施这种制度的国家并不多见,因此,在实施上必须慎重。

二、科技革命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以及高教改革的三项对策

潘懋元先生认为,在80年代初期,人们已明显感到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并制定了相应的对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8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高等教育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人们因此淡忘了科技革命的挑战。在90年代,世界科技革命的挑战更为强烈,并且从长远看,

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与高等教育发展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潘懋元先生指出, 科技革命与市场经济的挑战, 在最终目的上是一致的, 但在过程中往往会产生矛盾。说一致是因为科技革命的实质是生产力的革命,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同样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对于高等教育来说, 它们的统一性就体现在提高教育质量, 培养现代化所需要的专门人才上。”而矛盾是指市场经济追求短期效益与科技发展需要长期规划、追求长远目标的矛盾, 市场经济重应用、轻学术与科技发展需要培养有深厚理论基础的科学家的矛盾, 市场经济的逐利思想与从事科技工作所需要的奉献精神之间的矛盾等。市场经济对迎接科技革命挑战的负面影响, 有的是市场经济尚未完善所致, 有的恐怕是长期存在并起作用的。因此, 当前在强调高等教育适应市场经济的同时, 不能放松迎接科技革命挑战的任务。

如果说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挑战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的体制与运行机制上, 那么, 科学技术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既体现了教育的外部关系, 更体现了教育的内部关系。就外部关系而言, 科技革命引起产业革命, 随之带来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 从而改变人才市场对专门人才的数量、科类、层次和规格的要求, 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速度、结构、专业设置和培养目标。高科技的发展还会给人类 21 世纪的高等教育带来深刻的变化, 高等教育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着 3 个突出的矛盾, 即高科技与道德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矛盾、高科技与传统教学过程的矛盾、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不足的矛盾。就内部关系而言, 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是文化科学的传递, 培养专门的科技人才是高等学校的基本职能; 发展科技是高等学校的第二职能。高等教育与科学技术的这种内在必然的关系, 决定了科技革命与高等教育的发展, 不仅在目标上一致, 在过程上也一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高等教育迎接世界科技革命的挑战具有更为深刻与长远的意义。

早在 80 年代初期, 潘懋元先生就曾对新技术革命条件下高等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改革对策发表了重要的意见。在 90 年代初期, 他又适时地提醒人们不能淡忘科技革命对高等教育改革具有的根本意义。即使在信息高速公路对高等教育将要发生严峻挑战的今天, 我们发现他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对高等教育改革提出的对策仍然是基本正确的。第一, 迎接科技革命挑战的任务应主要落在教学改革上, 教学改革具有更为紧迫的意义; 第二, 把知识的传授与智能的培养结合起来, 不可片面强调任何一方; 第三, 应当十分重视思想政治、道德品质、文化素质的教育。下面拟结合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将对高等教育产生冲击的情况, 来说明潘懋元先生上述对策建议的正确性。

关于第一点, 潘懋元先生认为, 要把课程、教材、教法及教学手段的改革(更新、充实、提高)提到日程上来。目前, 信息互联网络已有可能实施多媒体的教学系统, 这样会对传统的教师作用、教材形式、课程组织、教学手段产生冲击。因为, 优秀的教师将与信息网络专家合作实行计算机非同步教学, 而不思进取的教师, 墨守成规的课程、教材和教法将不会吸引更多的学生来学习。我们并不认为未来的计算机多媒体教学系统会代替传统的教育、教学, 而是二者长期处于共存共荣、有合作又有竞争的局面。二者互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目标是一致的, 即促进教学改革深化, 提高教学质量, 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关于第二点, 有些人一提起科技革命的发展, 就容易把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割裂开来, 降低前者的作用, 片面夸大后者的作用。而潘懋元先生则始终一贯强调, 既要克服传统教育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片面性, 也要纠正过分强调能力培养、忽视知识基础的片面性。教学改革必须更多地重视能力培养, 但智能的发展必须以相当的基础知识为前提, 况且基础知识的老化速度远非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快。有专家提出, 在

信息高速公路的条件下,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将由知识论过程转变为信息论过程。我们暂不讨论这种提法的精确性,但它试图将知识的教学和能力的培养统一在信息的获得过程中,这点恰恰证明了潘懋元先生的不能人为地将二者割裂的观点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关于第三点,信息高速公路的实施,将有可能把我们所反对的西方和平演变的宣传、色情的传播、宗教的渗透一起经互联网络输送进来,因此采取一定的技术措施防范信息的污染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在于把改善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大学生的道德品质,加强其文化素质的教育提高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上来。此外,针对有些专家提出的学校、班级即将消亡的观点,潘懋元先生认为,校园文化的环境、学校班级的集体活动、师生课堂内外的交流对培养学生的集体、合作、组织纪律观念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远非高科技所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固然会大大扩展我们对课堂、班级、学校范围的理解,但那种否定传统学校、班级存在必要性的观点无疑是十分轻率和不负责任的。

三、文化传统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以及高教决策依据系统的完善

潘懋元先生认为,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面临的两个主要方面的挑战,但不是所有的挑战。因此他还进一步研究了传统文化对高等教育的挑战。

建国 40 多年来,人们在分析教育现象时,常常只考虑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对教育的作用,而忽视了文化传统对教育的作用。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妨碍了高等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有感于此,潘懋元先生于 1989 年写了《文化传统与高等教育的理论思考》一文。他认为,文化传统(指精神文化传统)以观念的形态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反映了社会制度的变革过程,同时以观念的形态根植于人们的意识与潜意识中。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对高等教育的制约往往要通过文化传统反射出来。文化传统一旦形成之后,即按照自身的逻辑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稳定的结构,不同的文化塑造了不同国家的教育,而教育则反映了一定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顽强的、广泛的,它几乎体现在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但主要体现在价值观、教育观、人才观上,如“学而优则仕”、“德才兼备”等观念。文化传统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虽然不同于社会生产力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对高等教育所起的作用,但却有其不可低估的力量。文化传统与社会发展的规律相一致时所形成的合力,对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但如果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抵触,则将会阻碍或延缓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任何文化传统都包含有二重性,即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它对高等教育所起的作用也是如此。因此,必须辩证对待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克服其消极因素,发扬其积极因素。第一,无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或对西方文化的吸取,都要进行主体判断与选择;第二,中国的高等教育应当肩负起融合中西文化传统的积极因素,创造适应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新文化的责任。这是因为高等教育在选择、传递文化的过程中也在创造着新的文化观念,并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适应社会的发展从而获得自身的生存。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文化传统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虽然广泛而深刻,但不能夸大文化传统的作用,更不应把文化传统看成是固定不变的。文化传统随着各国生产力、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或迟或早地改变着自身的存在方式;决定一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方面与性质的是该国的社会生产力,而不是文化传统,因为文化归根到底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

的反映。文化传统对教育改革起着推动或阻碍、加速或延缓以及改革过程中方式、方法的选择作用,但不能在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质量上起决定作用。

潘懋元先生对文化传统与高等教育关系研究的意义十分重大。首先,它是对我国近40年来高等教育发展中忽而政治化忽而经济化两大极端思维方式和做法的否定,是对建国以来高等教育改革经验的理论总结。即高等教育改革要适应的不单是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同时也要全面考虑到一国的文化传统的制约性。这对我们这样一个具有上下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泱泱大国尤其重要。其次,它对于我国教育决策依据系统的完善有重大意义。长期以来,教育理论界在提供决策依据,或教育决策部门在进行决策时,更多地考虑了政治、经济依据,而很少考虑文化传统的依据,致使教育的不少决策或是执行不了,或是很难执行,或是执行的结果导致高等教育改革大起大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沉痛的教训。第三,各国的文化传统不同,因此我们在高等教育管理改革过程中应当更多地考虑到本国的文化传统,而不是一味照搬外国模式。

四、实现教育自身的现代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 高等教育体系的方法论基础

最近几年,已召开了3次全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以下简称“特色高教”)的研讨会。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提出了特色高教的原则、框架和理论要点的方案,取得了许多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潘懋元先生虽未为特色高教提出一套框架或要点的方案,但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探讨传统教育与教育改革、现代教育与教育现代化这两对教育自身改革的重大关系上,从而以自己的方式为特色高教的建立提供了辩证法的方法论基础。

1 传统教育中精华与糟粕并存,对其要扬弃而不是抛弃

传统教育有广狭两义。广义指历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及人类历史长期形成的教育观点和经验;狭义指以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为代表的教育思想。二者所指不同,但含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德育与智育并重;重知识教学、轻能力培养;分科教学、班级教学、理论教学为主、课程讲授为主;重教师主导作用,忽视学生主体作用;忽视社会实践,等等”。由此看来,传统教育中既有合理的因素,应当在今天的教育改革中加以继承,又有与现代化教育实践不相符合的东西,需要抛弃。事物的发展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那种对人类历史积累下来的教育经验全盘抛弃的做法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必须根据特色高教的要求,遵循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对过去的教育做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扬弃过程,使过去的有效教育经验纳入特色高教的内容之中。

此外,还必须处理好下列3对关系:(1)知识与智能的关系。应当克服传统教育不重视智能发展的不足,更多地重视智能的培养;但智能的培养必须建立在基础知识的系统传授的基础上,否则智能的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2)专长与通才的关系。现代科学的发展是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因此过分地强调培养专才或通才都是片面的。从中国的国情来说,以有限的教育经费、教育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以及国家经济发展的赶超型而论,培养基础宽厚的专门人才是必要和可能的。(3)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今天在教育改革中,应当更多地发挥学生主体的作用,更多地考虑学生的身心发展特征,更多地发挥学生思维的主动性、积极性,但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即在选择教学内容、组织教学过程、激发学生思维等方面的作用不能

降低,反而要求更高了。特别是在大众传媒复杂多样的条件下,教师的主导作用尤其重要

2 现代教育不等于教育现代化,对西方现代教育应当既有“认同”又有“存异”

首先,潘懋元先生区别了“现代”与“现代化”这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现代”是一个历史学概念,它是相对于“古代”、“近代”而言的历史分期;而“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是“带有方向性”的变革过程。但二者又有联系,比如发达国家的现代社会既有符合某些方向性变革的特征,又有阻碍历史发展规律的现象。我们要搞现代化,不能不学外国先进的东西,同时又不能“全盘西化”,只能走中国自己的道路。现代教育与教育现代化的联系,区别也是如此。我国的教育现代化可以而且应当从现代教育中吸取某些先进的东西但又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教育的模式。

“现代教育”也有特指泛指两义。特指是西方教育史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欧新教育运动和美国的进步教育运动;泛指是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现实存在的教育思想和现状。西方现代教育的内容十分复杂,其中既有符合社会发展共同规律的一些特征,也有一些只体现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特征,还有一些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特征。由此看来,对西方现代教育持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的态度不是辩证的态度,应当区别不同情况,有所认同,有所存异。它的标准就是教育的内外部关系的规律。对于西方现代教育中那些适应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发展需要的理论和实践,比如终身教育、高校职能多样化、课程的灵活性,可以而且应当“认同”;对于现代教育中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学生生活自由化、师生买卖关系等,则不能“认同”;而对于那些既反映了文化科学发展共同趋势,同时又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通才教育、自主办学等,则应当既有所“认同”,又有所“存异”。即使“认同”,也不是照搬,必须考虑中国的特点,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服务。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教体系应当建立在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础上。在教育改革中,不借鉴发达国家的现代教育,就不能开阔眼界,而唯西方现代教育是趋,终究避免不了高等教育落后的局面。

参 考 文 献

- [1] 《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新华出版社1991年6月版。
- [2] 潘懋元:《高等教育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华文摘》,1993年第3期。
- [3] 潘懋元:《市场经济的冲击与高等教育的抉择》,《求是》,1993年第10期。
- [4] 潘懋元:《公私立高等教育体制的问题展望》,《民办高等教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 [5] 潘懋元、魏贻通:《立法——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保障》,《高等教育研究》,1996年第1期。
- [6] 魏贻通、潘懋元:《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投资政策》,《中国高教研究》,1993年第6期。
- [7] 朱国仁、潘懋元:《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中国高教研究》,1994年第1期。
- [8] 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辽宁高教研究》,1995年第4期。
- [9] 潘懋元、朱国仁:《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文化选择与创造》,《高等教育研究》,1995年第1期。
- [10] 潘懋元:《21世纪的高等教育》(在福建高等教育年会上的发言),1995年12月于福州。